

# 论邓小平机遇理论形成的基础

陈金兰

(西南科技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邓小平机遇理论形成的基础主要包括三方面:哲学基础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实践依据即对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思想渊源即对毛泽东机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邓小平;机遇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5-0005-05

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发展机遇理论,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追本溯源,探究邓小平机遇理论之所以形成,不难发现,它是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从国际国内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因此,本文试图从哲学基础、实践依据、思想渊源三个方面对邓小平机遇理论形成的基础进行探讨。

## 一 哲学基础——对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 1. 社会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原理

在人类认识史上,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它指出,社会的发展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的自然历史过程,其中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又是以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因此,社会发展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趋势,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同时,必然性和偶然性又是同一事物、同

一关系、同一过程所固有的两个方面,它们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同一的:必然性要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并得以实现;偶然性中隐藏着必然性并受必然性支配;偶然性和必然性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因此,必须全面、联系和发展地看待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克服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即只承认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而完全否认偶然性的机械决定论和把社会领域的一切变化和发展都看成纯粹偶然的,根本否认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的唯心主义非决定论。

邓小平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纠正了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一些人漠视历史偶然性作用的偏见。他认为,十年“文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缓慢发展并最终陷于停滞倒退的状态,其根本失误就在于:我们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理解为政治运动的不断高涨过程,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1](153页),试图以人们对某种高目标的崇拜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结果,政治的空谈淹没了一切。这就不可能发现由多样性人类实践活动所派生的历史偶然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不可能注重那

收稿日期:2004-11-12

基金项目:西南科技大学青年基金项目(SK043038)。

作者简介:陈金兰(1970—),女,四川三台人,西南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

些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种种历史机遇的作用。我们往往用等待的心理,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看成是被神圣化了的历史必然性的自发生长过程,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不是人的实践问题,而是一个先验模式的设定和实施问题,历史的挫折、经济的停滞不是“规律模式”出了毛病,而是人的思想意识出现了偏差;社会的进步无须对一切有利的外部条件和偶然因素的自觉利用,无须对一切具有种种发展因素的历史机遇的积极撷取,这些机遇统统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苗”、“资本主义的尾巴”、“渗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洋技术洋设备”等等。在邓小平看来,这种忽视具有社会发展意义的历史偶然性作用的思想理念,必然带来社会主义盲目排外、闭关自守的政策,其结果是长期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2](274页)。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怎样通过历史偶然性为自己开辟具有社会演化创新意义的发展道路呢?邓小平认为,最为关键的,是注重对具有生产力发展动力作用的历史偶然性即历史机遇的大胆吸纳与运作。社会主义只有主动吸纳和引进代表世界历史进程水平的先进经验、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才能通过不断调整和更换原有的生产体系和设备,加速生产力发展的进程,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117页)

## 2. 社会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

邓小平的机遇理论,体现了对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及其因素的重视。在充分肯定优越的社会制度——内部因素能促进我国社会更快发展的同时,他还强调指出:搞四个现代化,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邓小平把机遇视为社会行为主体为了实现社会内部结构演化创新进行能动选择的外部发展因素和条件。就利用外部发展条件而言,它至少有三层含义:其一,确认历史发展的机遇,有助于我们用外部世界发展的状况来对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从而产生“差距感”和发展的紧迫

感。用邓小平的话说,即用国际水平的尺度来衡量一下。“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0页),这“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1](90页)。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差距,才能把发展的危机感转变为实践变革的动力。其二,面对世界历史发展机遇,因势利导,可以帮助我们树立变革原型社会内部运转机制的新理念。他说:“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图强,尽快改变这情况;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1](90—91页)其三,大胆运用世界历史发展机遇,可以加速社会内部体制结构的转换。他指出,要“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1](135—136页)。

在邓小平看来,以往,我们丧失了历史发展的机遇,整整耽误了20年,原因就在于我们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把发展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社会内部的自然演化方向,认为惟有“内部因素”才是社会发展唯一根据。因此,社会主义要不要引进外来的技术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内部成员思想和灵魂深处有没有出现偏离社会主义的信念。这种忽视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的作用的倾向从根本上阻遏了内因发展的活力。邓小平的历史机遇理论,说明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时代,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因素是极为重要的历史参数,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时期,社会系统的内部演化创新离不开外部条件,历史机遇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热心社会转型的民族和国家通过对机遇的撷取和运筹,能够积极主动地引进世界一流的生产工具和科技产品,引进发达国家的管理技术,引进反映新时代潮流的世界文明的精品,从而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历史危机感和“不得不改革”的意识,促进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

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2](128页)这种方法体现了历史主体自觉投入社会变革的能动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人们在发展观念上对历史机遇的高度重视。

### 3. 社会规律的决定性和人的主体能动性辩证统一的原理

唯物史观在揭示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和决定性的同时,也充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认为社会历史规律的决定性与主体的能动性共同作用于历史进程,辩证地统一于历史进程。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人们面前展示了客观规律作用的诸种可能性,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客观规律的制约,而是积极能动地在客观规律作用的多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在历史趋势提供的契机面前,是实现这种可能性还是那种可能性,具体历史进程表现为这种态势或是那种态势,其时间持续和空间延伸或长或短或曲或直,这些都与特定时代、特定环境条件下的人的选择有密切关系。

邓小平的“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思想,强调在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理论克服了唯条件论和主观唯心论的片面性,坚持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那种认为“机遇”是决定事业兴衰成败的观点是唯条件论的,因为没有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相反,无视机遇,离开了事物发展的外部和内部的有利条件,以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们的革命热情和精神可以决定事业的兴衰成败,甚至可以决定一切,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这两种倾向,在实践中都会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相当大的危害,尤其是后一种倾向,危害性更大。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2](237页)。当然,抓住机遇的重点在于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为既然机遇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和利用机遇的角度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因此,邓小平一再提醒“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2](354页),“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2](365页)。机遇来临时,要善于识别、捕捉,面对机遇,要善于把握、利用,这都依赖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极大

程度的发挥。

## 二 实践依据——对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 1.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的科学借鉴

通过对阶级社会人类发展诸多转折时期的研究总结后,德国近代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指出:“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整个民族的前途,把握得当,其民族便能主宰其它民族的命运,把握不当,自身的命运便成为其他民族的目标。”[3](544页)为什么?因为历史转折时期,相对于历史平静时期而言,更能体现出社会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创新变更趋势。在这种关键时刻若能抓住机遇,就能体现出社会的整体性和根本性的速度,缩短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表现出某种非常规发展的跳跃性。对此,邓小平有深刻的认识:“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2](369页)邓小平立足于社会历史转折时期,从机遇与发展相互联系的角度,对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进行了科学分析与总结。他认为,就国际方面讲,因为抓住了机遇,“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2](368—369页)。其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就是最典型的范例。

50年代中期以来,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迅速兴起,这就为很多国家的经济飞跃提供了历史的契机。我国的近邻日本,二次大战后,作为战败国,其经济几乎崩溃,1945年的人均GDP仅有45美元。但由于日本抓住了这次新科技革命的机遇,积极引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据统计,1965年日本同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还相等,20年之后的1985年便是我国的5倍,1992年更是我国的8倍。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20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7倍,而我国仅增长3倍[4]。对此,邓小平深有感触:“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2](274页)

被人们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据统计,整个60年代,“四小龙”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剔除物价上涨因素)为香港地区13.7%、新加坡9.4%、中国台湾省9.3%、韩国8.9%;70年代则为香港地区9.3%、中国台湾省9.8%、韩国9.5%、新加坡8.5%[5]。

也就是说,这20年,“四小龙”持续保持了10%左右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这样的速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且高出美国及欧洲共同体等发达国家的增长率1倍以上,甚至大大超过了60年代的日本。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把握机遇、科学决策。可以说,如果没有对历史机遇的适时把握,“四小龙”发展的道路会艰难得多。有鉴于此,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2](63页)“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2](369页)

## 2.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

我国在经济发展史上有过许多次与发展机遇失之交臂的惨痛教训。邓小平的发展机遇理论,正是从这一事实出发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8年“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20年的经济发展转折时期,我国没有抓住机遇,耽误了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又在“两个凡是”的干扰中徘徊了两年。这样,我们没有抓住在50年代发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60年代发生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后世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遇,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历史是一部教科书。反思历史,我们懂得了丧失机遇的严重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通过否定“两个凡是”和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了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2](383页),“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2](375页)。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这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停滞到对外开放,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到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转型,任务艰巨。邓小平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现实紧迫感,提出了旨在加快中国发展的机遇理论。

## 三 思想渊源——对毛泽东机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的机遇理论,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深深打上了中国革命的烙印。一方面,由于极大的变动性和复杂性,客观条件上出现各种机会的可能性较大;另一方面,实际斗争的主观指导下,迫切需要争取各种有利条件,利用机遇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毛泽东的机遇思想,就集中体现在他的军事思想中。作为中国革命光辉记录的毛泽东著作,其中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关于机遇的思想,记录了各种利用机遇的事实。

首先,在毛泽东的著作中,特别是他的政治、军事著作中,大量地记录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机”:“战机”、“契机”、“时机”、“良机”、“先机”;使用了“相机”、“伺机”、“乘机”、“待机”、“随机”、“当机”等等,表达了在各种各样“机”的出现之前、出现之时、出现之后,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要求;始终不渝地要求“占机”,不可“失机”。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谈到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时,他说:“在和敌人准备‘围剿’的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6](100页)“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重新进攻刚刚开始,又恰好遇到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接着他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则:“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的情况和二者的关系着眼。”“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

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6](201页)这就阐明了把握时机的重要性,也指出了断定时机的着眼点和基本原则。这不仅表明了毛泽东完全肯定事物发展中“机”的客观存在,高度重视这些事物发展中的“机”,而且充分表现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纯熟利用事“机”的高超艺术。

其次,在毛泽东著作中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研究,关于不同时期的形势分析以及依据这些科学分析所作的重大战略决策,实际上在不少场合渗透了机遇思想。例如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写道:“一国之中,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

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6](48页)他系统分析了这些原因和条件,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6](49页)“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6](51页)这里所说的这种条件,其实就是一种机遇。

邓小平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真谛,充分接受了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丰富的机遇思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将抓住机遇的重要性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实现了认识上的新飞跃,形成了系统的社会发展机遇理论。这一理论自90年代起已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

####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 [3](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 [4]中国不能再错过机遇[J].中国经济时报,1997-05-15.
- [5]转引自:肖日新.亚洲四小龙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经验[J].东北亚论坛,1997,(2).
-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On the Basis of Deng Xiaoping's Opportunity Theory Formation

CHEN Jin-lan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China)

**Abstract:** The basis of Deng's opportunity theory formation encompasses three aspects: philosophical basis, creative exploi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ocial historical dialectics; practical basis, a scientific summing-up of exterior and interi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and teachings; ideological sourc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opportunity thought.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opportunity theory; basis

[责任编辑:苏雪梅]